制度型开放是服务贸易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让“中国服务”成为我国应对大变局的底气

■ 本报记者 张寒梅

202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关口，在2021年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这为我国迈向贸易强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月21日，同济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就如何建设贸易强国建言献策。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要为成为贸易强国而努力。国际社会对贸易强国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拥有极强的竞争力，产品拥有较好的质量，在国际贸易中拥有重大产品的定价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和贸易活动的主导权。”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说，中国需要利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来推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的融合，使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发挥巨大的吸引力，让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更加畅销，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他看来，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使中国贸易与全球贸易更加紧密融合。

无论是之前我国加入WTO、签定RCEP等19个自贸协定，再到目前正在积极谋求加入CPTPP，启动DEPA谈判，不断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都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行动。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刘兴华认为，制度型开放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动力；二是通过实行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为促进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继续贡献中国力量；三是积极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完善，为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智慧。

除此之外，贸易结构调整，特别是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发展，将成为推动制度型开放，建设贸易强国的一条新路径。服务贸易是我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制度型开放是服务贸易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我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仍有巨大空间，关键是加快释放服务贸易潜力。在产业结构变革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双重推动下，如果高水平开放相关举措能够进一步推进和落实，预计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20%左右。

“服务贸易由此将在我国贸易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服务’竞争力也将不断增强，成为我国应对大变局的重要底气。”迟福林说，我国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优化仍有较大空间，需要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特别是在稳步扩大服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上下功夫，增强贸易结构转型的动力。

他认为，未来几年，我国要以RCEP为抓手，与其他成员国合力建设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务实推进RCEP进程，有利于拓宽贸易结构转型空间。

相关数据显示，RCEP生效前的2021年，中国与东盟服务进出口超过67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0%，如今，RCEP已经生效实施，中国与包括东盟在内的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潜力将进一步激发出来。

“在RCEP协定的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入世100个部门开放承诺的基础上，新增了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空运等22个部门的开放承诺，并提高了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同时承诺在6年内把服务贸易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迟福林说，加快落实这些条款，将把中国巨大的服务需求与RCEP的服务贸易市场对接起来，推动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鲜明特征。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制度性变革与制度型开放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特点明显；扩大开放的重点由边境外向边境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延伸的趋势明显。”迟福林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是最大的改革。为此，需要加快深化服务领域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突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建设，并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中倒逼全面深化改革。

全生产要素最佳配置是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口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 本报记者 张凡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而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那么，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是什么？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制度型开放到底有多少红利？在同济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月21日举办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上，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分享了他的所思所想。

“未来五年，制度型开放将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红利，其效果甚至不亚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魏建国这样说道，随后就详细地给出了三大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传统的国际经贸秩序规则和由商品与要素组成的流动型开放至今已难以适应当前国际新形势的需要。魏建国分析说，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本质是降低关税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关税壁垒。这种开放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是二战后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许多规则都是有利于西方国家，根本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暴露了这种规则的缺陷，也使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这种商品和要素流通型的开放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更谈不上给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新活力。”魏建国接着说第二个理由，“如果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是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全生产要素的基本组合的话，那么制度型开放将是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前者是基本的组合，是被动性的，而后者是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因此，制度型开放所带来的红利和所释放的能量将远远大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

魏建国表示，制度型开放就是我国不仅要把国内的生产要素进行最佳的配置，而且希望能够把全球的生产要素进行最佳配置。那么，中国就必须把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了解它的演变特色，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要开放红利。

“第三，制度型开放不仅仅是指经济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而且涉及到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司法等方面。因此，我们对外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我国的制度型开放将是一个全面的、新型的制度型开放。这样的制度型开放所释放的潜力是无穷的。”魏建国说，这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又一个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也是最难的一个时期。目前，我国已经在海南、深圳、上海浦东做了一些先行先试，已经积累了很好的探索经验。

这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将更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也将表现得更加全面、更加长远。在魏建国看来，推动制度型开放，要做好顶层设计，特别是要在大胆闯、大胆试的自主改革进程指导下，以问题为导向，拿出前瞻性较强、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顶层设计；主动对标各种自贸协定，特别是RCEP和CPTPP等；不搞单兵推进、零打碎敲，要真正实行立体式、全方位的改革。

国际商情

墨西哥将锂矿储备国有化

西班牙《公众》日报2月20日报道，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索诺拉州宣布了一项法令，将墨西哥的锂国有化，并将其整合为“国家财产”，以进行负责任的勘探和开采。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强调，将锂国有化意味着它不能被外国人开采，“石油和锂属于国家，属于墨西哥人民”。他表示，制造电动汽车是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将推动这种用于电动汽车的战略性矿产的勘探和生产，这是整个北美地区人民和政府的目标。汽车厂将被彻底重新改造，这就是为什么锂是必不可少的。”

2023年，索诺拉州的碳酸锂产量预计可达到1.75万吨；到2026年，产量预计将翻一番，达到3.5万吨。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墨西哥以170万吨的锂资源储量排名全球第十。

全球性铜短缺或将持续数年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近日报道，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推动了对作为线缆材料的铜的需求，遗憾的是，铜业的发展没有跟上这一转型的速度，因此目前存在全球性的铜短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拉美供应放缓和全球需求增加所致。分析师们预计，这种短缺可能将持续数年。

安永（西班牙）公司的企业财务咨询领域合伙人胡安·曼努埃尔·马丁内斯预计，未来几年内，铜的价格将保持在每吨8500美元以上，甚至有可能超过每吨10000美元。受到美元贬值以及关于全球最大铜消费国中国的需求将被重新激活的预测影响，铜价在1月份达到了七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每吨9550美元）。

铜价也受到了供应限制的影响。世界第二大铜供应国秘鲁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受到抗议浪潮的困扰。秘鲁国家矿业、石油和能源协会估计，骚乱影响了该国铜业生产的大约30%。

全球半导体设备巨头业绩下滑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全球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的业绩增长明显放缓。在9家主要企业中，有8家公司2023年1月至3月营收额将出现同比下降或增长放缓。

根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组织的预测，2022年世界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将以1085亿美元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但2023年将出现4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原因之一是半导体企业减少投资。受智能手机等终端需求减弱和经济减速的影响，半导体用户开始压缩这几年积累的过度库存，半导体市场正迅速恶化。尤其受影响较大的存储器大企业在2023年的设备投资将锐减，韩国SK海力士的设备投资将比上年减少50%以上，美国美光科技则减少40%左右。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日前在浙江省玉环市干江工业区的浙江凯博特种合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力争实现生产经营“开门红”。
中新社发 吴达夫 摄

阿里国际站3月新贸节新能源出口趋势：充电桩成新机会

在阿里国际站上连续三年火爆的新能源出口行业，今年不仅仍将保持高增长，更涌现出新的机会点：新能源车充电桩。外贸行业开年第一个旺季“3月新贸节”即将来临，阿里国际站发布了最新的跨境指数，过去一年新能源车充电桩的海外商机快速增长了245%，而在未来还有近3倍的需求空间，将成为国内外贸企业的新机会。据悉，阿里国际站上充电桩需求主要来自欧美市场，其中英国、德国、爱尔兰、美国、新西兰是阿里国际站上充电桩搜索热度前五的国家。

阿里国际站相关行业运营负责人认为，当前充电桩需求旺盛，主要是因为新能源车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普及。2022年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车销量达到1082.4万辆，同比增长了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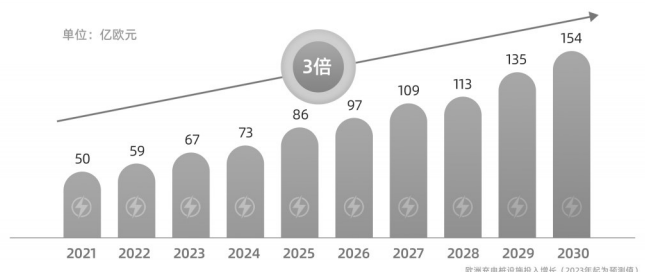
尤其是近日，欧洲议会还通过了2035年欧洲停售燃料发动机车辆的议案，也有望进一步推动欧洲市场新能源车销量的提升，由此带动充电桩需求的增长。研究机构预计，未来十年，欧洲充电桩需求将从2021年的50亿欧元增长至150亿欧元。像充电桩这类新的外贸需求，传统采购渠道较少，因此数字化外贸的使用比例会更高。

阿里国际站即成为国内企业抓住这一机会的重要平台。为此，阿里国际站近期也提供更多支持，帮国产充电桩企业拿下更多订单。据悉，在即将到来的3月新贸节期间，阿里国际站将专门开设“特斯拉专区”。根据最新的跨境指数发现，特斯拉等新能源车的第一波交付高峰发生在2018年，按照4年保修的时间推算，第一批新能源车的保修期将在今年结束。由此，这批车主会有大量新能源车配件的购买需求，预计给国内充电桩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而根据阿里国际站跨境指数，中国产充电桩的海外买家主要为当地批发商，占比约为30%，另外还有建筑工程商和物业商各占20%，这两类需求在阿里国际站上都有极大机会。像主要研发新能源车动力系统、充电设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武汉合智数能”，从2018年开始尝试拓展海外业务以来，所有海外线上客户均来自于阿里国际站，目前该公司的产品已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去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合智数能”就通过阿里国际站向卡塔尔提供了800套电动客车充电设备。

除了充电桩，阿里国际站跨境指数还显示，整个新能源行业的热度今年还将持续。热门商品中，便携式充电宝的商机同比增长达268%，家用储能系统的商机增长125%。

（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供稿）



2023年稳外贸还需“活血减压”

■ 本报记者 王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在2023年从去年估计的3.4%放缓至2.9%。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或将只增长1%，远低于此前预测的3.4%，这将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2022年中国外贸顶住多重超预期压力，实现了稳定增长。面临着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外需走弱等考验，今年中国外贸将如何解压？

2月22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0期）上，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表示，“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冲击之下，去年四季度中国出口同比大幅下降，但月度同比出现下降，从历史维度来看，并非罕见现象，是外贸的正常波动。单月同比出现下降，是周期错位影响，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趋势会变坏，还要结合整体情况分析，中国外贸的优势和竞争力没有发生变化，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王孝松分析道，2023年中国外贸面临着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外需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数量增加、疫情对贸易的持续负面影响等不利因素。“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实施的叠加，有利于区域贸易发展，制造业基础扎实、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重点行业研发投入充足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看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仍在释放，将给中国外贸进出口带来压力，但中国贸易整体仍相对有韧性，有望继续承担全球化“稳定器”的作用。

梁明对此持相同看法，他的信心在于，“国际市场是需求增速在放缓，而不是总量在放缓。目前来看，国际市场需求是一个结构性的放缓，并不是全部的下滑。今年做好一些结构性的开拓工作，我们外贸进出口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王孝松提出了2023年中国外贸实现突破的路径：

充分利用RCEP的政策红利。推动RCEP相关措施在全国落地；升级监管作业系统，规范简化手续，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服务企业抢抓RCEP机遇，用足用好各项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开拓RCEP市场；完善针对RCEP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挖掘低碳环保高科技产业潜力。我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数字经济等领域，具有研发和商业化应用场景优势，有望在全球能源转型的碳中和贸易中争取主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业在全球已经具有较高竞争力，未来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挖掘低碳环保高科技产业的贸易潜力。

重视新业态新模式的推动作用。未来围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保税维修、离岸贸易、海外仓等6种新业态新模式，区分共性与个性，分类制定切实管用、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要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能外贸发展，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培育一批优秀海外仓企业。优化市场采购贸易政策框架，支持更多市场主体开展外贸，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

改善营商环境迎接产业转移。欧洲部分制造业外迁主要是第五次产业转移的自然过程，欧洲能源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作用。能源价格上升会在短期内加速欧洲相关行业向中国转移，方式以贸易为主，以投资为辅。长期来看，产业转移有利于国内中间品的需求释放，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升级和产能的再匹配，有利于我国提升“竞争、合作”的供给议价能力。中国政府要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改善营商环境，相关行业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

程实特别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应以大湾区为平台挖掘中国外贸新潜力，推动强链补链，加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抓住头部企业，尤其是大湾区内科技龙头企业，利用技术与知识在产业链上的“外溢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湾区产业集群。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激活产业链上中小企业活力，推动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演进，优化产业布局、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